

· 语言文学艺术研究 ·

两宋科举与文学教育

吕肖奂¹, 张剑²

(1. 四川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64;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73002)

摘要: 宋代的教育, 可以说是围绕着科举考试的教育, 而宋代的科举考试, 又是对宋代教育的考察和检验。科举与教育, 在宋代重文抑武的国策和社会风气中展开, 而文学教育就在“人文性”极强的科举制度下普及到宋代社会的各个层面。

关键词: 两宋; 科举设科; 科考内容; 公私学校; 科场之文; 文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分类号:** 1674-7089(2010)04-0096-07

经过隋唐三百余年的不断发展, 科举制度在宋代更加完善成熟, 也因此对宋代的社会尤其是宋代的教育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科举的政策与措施、设科与内容, 直接引导着教育的目的与方向, 制约着教育的内容与方式, 科举有时几乎是强制性地引导或制约着两宋的教育。不仅如此, 宋代的科举, 还是对宋代教育的考察和检验。两宋的教育目的和内容, 差不多完全是以科举考试为重心而展开的, 也就是说宋代的教育, 是围绕着科举制度的教育。

两宋科举与教育关系密不可分, 又都在宋代重文抑武的国策下进行, 因此又都明显体现出宋代“文治”的基本国策。科举是“人文”性的科举, 教育也是“人文”化的教育。本文的文学教育就是指这种“人文”化教育, 也即以文学创作为重心的所有相关人文学养的教育。

一、人文性科举设科对宋代教育的导向——
重文轻武

科举制度的最终目的是为国家选拔人才, 国家对哪种人才的需要, 就成为科举制度的指导方针。宋代是文官政治, 重文抑武是宋代的基本国策, 因此科举制度就是对这项国策的回应, 大量的文职官员成为科举制度选拔的焦点, 而“文”更成为科举制度的重中之重。

两宋科举包括贡举、武举、制举(又称制科)、词科、童子科及宗室应举等名目, 其中只有武举主要选拔武职人员, 而其他科目均为选拔文职人员而设。仁宗天圣七年正式设立武举, 由尚书省兵部主持考试, 以弓马武艺为主要考试内容, 这似乎表示重视武人与武职, 但实际上武举在两宋一共举行过 77 榜, 取士约 2516 人以上, 而常科贡举则举行过 118 榜, 取士近 11 万^①, 还不算其他“文

收稿日期: 2010-04-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07BZW036)

作者简介: 吕肖奂, 女, 河南灵宝人, 博士, 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 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张剑, 男, 河南遂平人, 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编审, 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举”科目。由此可见，宋代科举本身就重“文举”而轻武举，况且通过武举进入仕途的人，地位远低于贡举出身的人，因此，武举颇受时人冷落，在教育中所占比重也很小。

事实上，科举科目除了武举之外，无不以文学才华（古人称之为“文章”“文艺”）以及与“文艺”密切相关的文史知识或人文修养为考核对象，因此均可称作“文举”。贡举是科举最基本的常科，不仅官方重视且最受时人重视。贡举虽然在进士科外还设有诸科，但是进士科地位远高于诸科，所谓“宋初承唐制，贡举虽广，而莫重于进士、制科”^②，而进士科是最为偏重“文章”或“文艺”才能的科目，这在当时科举、教育乃至整个社会中可谓领“人文化”风气之先，以至于其偏重“文艺”而忽略“德行”，重视“浮华”而轻视“实学”，引起宋代不少士人的忧虑，如“然历代之议贡举者，每曰：‘取士以文艺，不若以德行就文艺而参酌之；赋论之浮华，不若经义之实学。’”^③进士科向文艺的倾斜，其实是整个科举的倾斜，导致教育也向文武、文德、文实几个方面有所倾斜。“礼部取士专用文章为甲乙”^④的缺陷在唐代时已经十分显著了，但是这种缺陷并没有被及时制止，而是随着宋代重文抑武政策的推行而愈演愈烈了。

贡举的诸科（北宋存在）有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传、三礼、学究、明经、明法等科，除了明法主要考试法律条令、似乎与文学关系不大外，其他科目均考试的是古代经、传、礼、史知识，仍是文史哲方面即与文学相关的人文学科知识。诸科所用的帖书、墨义等考试方式，考核的是士人的文史哲知识记诵能力（博学强记），目的是提高士人经史学素养。这些表面上虽说不是进士科那种直接的文学创作，但依然是对士人文学底蕴的“人文化”培养。诸科出身的人地位虽然低于进士科，但仍高于武举，而且因为宋人一贯注重经史等“实学”修养，所以两宋实际上都没有轻视诸科，甚至时不时有以“实学”替代“文艺”的倾向和举措，到南宋还融合到经义科中，受到更多重视。

制举（即制科）在宋代非常科，只有在国家有

重要事情时，才临时设立科目，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经学优深可为师法科等，分两级试。最重要的是在阁试（制科初级试）前交五十篇策论呈给两省侍从官参考，到殿试时又要亲对皇帝的策问，其关键在于考察士人对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文化等事务或问题的见解与谋略，似乎与“文章”“文艺”无关，但是，实际上如果其对策“言而不文”，仍会被黜落。词科专为选拔撰写朝廷应用文章而设，是甚至比进士科还要重视“文章”“文艺”的科目，加上士人考中之后在仕途上多能飞黄腾达，因此更能吸引人们对应用文学的重视和投入。制科与词科考核的文学创作比进士科考核得更加专业，对士子的文学创作能力要求更高，需要应试者比一般士子有更多的文学才华并受到更良好的文学教育。

童子科是为十四岁以下儿童专门设立的科目，宗室应举则是专为皇族宗室设立的科目，这两种考试均是为特殊人群特设的科目，虽说针对的应试对象有所不同，但在考试内容上，与普通贡举并无太大区别，基本上都是向“文艺”倾斜的“文举”。

简单概括了科举各项科目，可以发现科举各种科目基本上都以考核士人的文学才能以及文史知识为内容，这首先反映出文官政治体制对“文艺”的极度重视。当然，宋朝不仅只是国家政治体制或政策上重文轻武，而是整个社会都弥漫着重文轻武的风气。武举出身、精通武艺或爱好谈兵的人，在当时社会上就颇受歧视。《宋史》卷四二七《张载传》云：“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韩琦知定州时，欲斩军官焦用，手下总管狄青求情说焦用有军功，是“好儿”，韩斥之曰：“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也，此岂得为好儿耶？”当面诛杀了焦用，使狄青战灼久之。^⑤张载有为国家收复失地的行为和壮志，却得不到称扬；狄青为北宋名将，韩琦对其求情不屑一顾，宋人之轻武着实令人震惊。阆中三陈之

一陈尧咨以善射著名，作为文人而有这种技艺非常难得，但是在宋代却备受冷落乃至嘲讽，不仅欧阳修笔下的卖油翁说他的射艺是“无他能，但手熟耳”^⑥，就连他的母亲都不引以为荣而反以为耻：“尧咨善射，知荆南时，母冯氏问曰：‘古人居一郡一邑，必有异政，汝典郡有何治效？’尧咨曰：‘荆南当冲要，郊劳宴饯殆无虚日，然稍精于射，众无不服。’冯氏曰：‘汝父训汝以忠孝俾辅国家，今不务仁政善化，而专卒伍一夫之技，岂汝先人之意邪？’杖而击之。”^⑦作为一个家庭女性，冯氏的观点其实代表了当时社会多数人的观念。她不仅在家中如此批评教训她的儿子，甚至敢理直气壮地使皇帝收回成命：“尧咨善射，尝取钱为的，一发贯其中。于兄弟间最为少文，任气节，真宗尝欲授以武职，尧咨母不可，乃止。”^⑧皇帝的任命都能被妇人拒绝，武职之受整个社会的轻视可见一斑。后来，连皇帝都认为文职高于武职。宋仁宗天圣五年“五月辛丑，诏武臣弟侄子孙之习文艺者，听奏文资。”^⑨词人贺铸就是在这种社会观念中由武职改换文职的：“贺铸字方回，开封人也，孝惠皇后之族孙，授右班殿直。元祐中，用武易文，为通判泗州。”^⑩战功赫赫的狄青在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枢密使时，都遭到了众多大臣的猛烈反对^⑪，就是文臣们重文轻武的典型事例。从女性到文臣儒将都看不起武职、武艺，这就不仅仅是国策或体制上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观念与风气的问题了。科举设科倾斜于“文艺”，是国策、体制以及整个社会观念造成的。

苏轼曾言：“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何者？利之所在，人无不化。”^⑫科举制度是教育的风向标和指挥棒。士人的文学才华以及文学技能，被科举制度提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因而造成宋代整个社会教育的价值取向向“文艺”倾斜。宋代科举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教育的主要目的，而宋代教育的目的主要就是让更多的士人科考及第然后走上仕途，因此科举设立的科目，常常就是教育的科目。

二、人文性科考内容与标准对教育的调节和检验——文学重心凸现

科举考试的内容与评价标准，调节着宋代整个社会的教育方向，当科举内容与标准改变时，公私学校的教学风气都会有相应的调整，显示出对宋代教育不容忽视的制约性。

“昔祖宗之朝，崇尚辞律，则诗赋之工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⑬这是北宋前期进士科考试内容变化的一些状况。北宋中后期进士科的诗赋策论曾经一度让位于经义，神宗熙宁八年曾颁王安石《三经新义》为科举教材，徽宗政和间甚至著律令，“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畏谨者至不敢作诗”^⑭，诗赋策论受到压制。至南宋，则逐渐演化为经义科与诗赋科并行的局面。两宋科考内容有多次调整变化，整个教育也随之有不同的重心转移。但从变化最多的进士科来看，诗赋策论与经义的调整，也只是人文性科考考试的内部调整，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就各个科目主要考试的内容来看，科举考试重视“文学”的程度是令今人大为吃惊的。进士科考试的主要是诗赋策论或经义，而诗赋策论都是文学的常见形式，经义是文学创作必备的修养。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云：“又南省考试举人，一场试诗赋，一场试策，人皆精意尽其所能，复考较日久，实少舛谬。及御试之日，诗赋文论共为一场，既声病所拘，意思不远，或音韵中一字有差，虽生平苦辛，实时摈逐。”^⑮这段话虽然只是强调殿试时间仓促，不像省试时间那样长而能够考察出土人的文学才能，但是，我们从中能够感受到科举考试对文学技巧以及敏捷的文学才能的要求。制科主要考试策论，与进士科有些相似，但要求比进士科还要高，其文采与其议论见解一样重要。尤其是词科，要考试章表、诚谕、露布、檄书、赋颂、箴铭、序记等多种应用性文体，均用四六骈体，要求几乎是唯美的，对其文采的要求远超过对内容的要求。童子科要求应试童子能够背诵六经以及

《孝经》《论语》《孟子》显示出基本的人文学养根底，如果能写赋、诗各一首，或者写议论大经义的文章三道，才可以达到上等标准，对于十四岁以下的儿童而言，必须有非凡的记忆力和超凡的文学才华才能达到，北宋著名文人杨亿和晏殊，都是应童子科而及第的，其文学才能应该来自于科考对文学的重视以及早期的教育。

科举考试的录取标准，实际上就是衡量教学效果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以两宋最为人关注的进士科为例，其最后一级考试即殿试的录取标准，按举子们诗、赋、策、论或经义等的写作水平分为五等（又称五甲），这是大中祥符四年《亲试进士条制》的规定。另外，赵抃在充御试官时，记录嘉祐六年殿试评卷五等标准是：“第一谓学识优长、辞理精纯、出众特异、无与伦比；第二谓才学该通、文理周密，于群萃中堪为高等；第三谓艺业可采、文理俱通（须合得及第者）；第四等谓艺业稍次、文理粗通，于此等中仍分优劣，优即为第四等上；第五等谓文理疏浅，退落无疑（须必然合落者）。不考谓犯不考式，纰缪谓所试文字并皆荒恶。”^⑩与大中祥符四年标准基本相同。从中可以看出，士子“才学”、“文理”、“艺业”的水平高低，决定了他们能否被录取。这个标准完全是为考核学子们的文学创作才能而确立的。制科、词科、童子科、宗室应举等的录取标准也都基本如此。

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标准，形成了对教育的要求与制约，考察和检验着各级教学效果。因此各级教育也多以科举的内容和标准为教学的内容和标准；科举对文学才华与才能的重视，也使宋代教育整体上呈现出文学教育的倾向。

三、宋代教育与人文性科举的对应性——文学教育的表现

宋代教育机构健全，各级学校齐备，京师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立于京师四门），州府军监有州学、府学、军学、监学，各县有县学，这些是官办学校，此外有私办官助的各地书院，还有私办的私学、族学等等，这些公私学校构成了宋代教育主

体，体现了宋代教育主旨，贯彻落实了文学教育与人文性科举的主要精神。当然，宋代官学尚有书学、画学、医学、律学、武学、算学等专门知识技能学校。但一方面这些学校往往立而不常，一方面不太受官方乃至全民的重视，在教育中所占的地位和比重不能与太学等文史综合类学校相提并论，况且律学、书学、画学在今天看来也都属于人文艺术教育，是文学教育的人文基础补充。

科举设立的科目，往往就是教育设立的科目。太学等各级公私学校一般以教授经书、儒术、行义等经史知识或基本人文修养为基本内容，而科考程文也是两宋最为重要的教学内容。科考文体如果没有长时间反复地传授和训练，在短促的考试时间限制下和强大的精神压力下，是无法一蹴而就的。文学教育因此通过科考文体和人文知识的传授与训练，深入到受教育的各个层面，鲜有文人士子能够脱离这样的教育环境而成长。

宋代学校教育内容与前代相比有较大差别，它更注重“科场之文”或“场屋之文”。宋人在讲到古今学校差异时云：“班《志》以庠序为礼乐之原；董仲舒、刘向，汉大儒也，其论礼乐教化，必曰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又曰：兴辟雍，设庠序，隆雅颂之声，盛揖逊之容而已。……秦灭先代之教，而汉人置博士弟子员所致功令，复以利禄之路诱之（详见《艺文志》功令说），虽曰设太学致辟雍，所养所教之科，与虞周异矣！此班固所以叹建武、永平之威仪虽美而礼乐犹未具也。东都太学诸生迭相标致，激成党锢之患。唐制由学舍之选者，谓之生徒者，未免乎科举之累。宋朝因唐制以取士，自京师至州邑皆有学，而礼乐之坏，反自学校始，由所习者皆场屋之文也。礼义之地，既为利禄所移，礼闈贡举又为刑名所禁，欲以是为礼乐教化之原，难矣！”^⑪可见，宋代京师州县学校中，对“场屋之文”的重视程度已经超过了“礼乐教化”的重视，整个的教育已经向“场屋之文”倾斜。

太学是宋代最高学府，引导着京师州县学校文风乃至教育的潮流。“（欧阳修）知嘉祐二年贡

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⑧。所谓“太学体”无疑就是太学盛行的“场屋之文”文风。宗室赵子昼的学习经历可以证实“监学”（国子学）同样重视“场屋之文”的教育：“初入南京国子监，于经籍固已贯穿便习，视当时场屋之文，意以谓殆可不学而能。每较艺试闈，日未中文就，徜徉笑谑，若不经意者。及榜，名累出诸生上。年未冠，遂中大观元年进士第，为宗子第一。”^⑨太学、监学如此，其他学校可想而知。

南宋刘炎《迩言》卷六云：“或曰：‘近世何师道之不立耶？’曰：‘古者师道德，汉魏以来师经学，隋唐而降所师者，场屋之文而已，宜乎师道之不立也。’”刘炎认为“师道”的破坏就像“礼乐教化”的破坏一样，都是因为“场屋之文”的盛行，尤可证明当时各级教师总以“场屋之文”为教学重心。周行己云：“夫道之不明，天下学士沦于流俗，以圣人书为发策决科之具。父教其子，兄诏其弟，师传其徒，莫不一出于此。虽有良质美才，生则溺耳目恬习之事，长则师世儒崇尚之言，至头童齿豁，不知反一言以识诸身。”^⑩欧阳守道云：“近岁士习趋下，号称前辈者，或亦止于传习场屋之文，漫不省讲学为何事。幸而收科，自谓一第如探囊中物，不复增益其所未能。后学效之，凡书肆所售，谓之时文，空囊市去，如获至宝，而圣贤格言大训，先儒所为孳孳讲切以觉人心者，反弃置之以为非。”^⑪这两段话进一步说明南宋教育中，“科场之文”比北宋时期更受重视、占有更大比重了。

学校之外，社会、家庭也同样注重“场屋之文”教育。从孩童起，学子就不不仅要记诵广博的文史知识，而且要学习声韵、属对、文采等创作诗赋的格律与技巧，更要熟悉“场屋之文”常用文体创作的基本状况和要求。应该说几乎所有士子接受的都是这样的教育，而且是通过这样的教育走向社会或者中举走向仕途的，“况臣少时学为场屋之文，随众觅举。”^⑫“某自为儿童，即闻阁下场屋之名，及有知识，又诵阁下场屋之文”^⑬。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庭、社会，士子都必须关注与“场屋之文”相关的一切信息。

“场屋之文”受到了两宋有识之士的批评和鄙视，如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一《选举考》四云：“盖场屋之文，论策则蹈袭套括，故汗漫难凭；诗赋则拘以声病对偶，故工拙易见。其有奥学雄文、能以论策自见者，十无一二。而纷纷鹄袍之士，固有头场号为精工，而论策一无可采者，盖自庆历以来，场屋之弊已如此，不特后来为然也。”“场屋之文”不仅本身有很多毛病，而且后患无穷。经过大量、反复或长期的“场屋之文”教学训练，士子们常常会形成一种程式化的作文“习气”，这些“习气”往往根深蒂固，一生都不能彻底消除，以至于影响到中举后的文学创作。譬如“词科习气”，就特别影响文学创作。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三谈到吕祖谦的创作时云：“东莱早年文章，在词科中最号杰然者，然藻绩排比之态，要亦消磨未尽，中年方就平实，惜其不多作而遂无年耳。”吕祖谦文风之所以深中词科“藻绩排比”的流毒而无法“平实”，就是因为其早年教育中过于长期地练习了词科文体程式。经常练习词科的四六文，还会影响诗歌、古文创作以及其它文体如碑铭的创作。方回《桐江续集》卷八《读张功父南湖集并序》：“功父尽交一世名彦，诗集可考。然南渡以来，精于四六而显者，诗辄凝滞不足观。骈语横于胸中，无活法故也。然则绍圣词科误天下士多矣！”《鹤林玉露》丙编卷二：“杨东山（长孺）尝谓余曰：……渡江以来，汪孙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诗。其碑铭等文，亦只是词科程文手段，终乏古意。近时真景元亦然，但长于作奏疏。魏华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记，虽雄丽典实，大概似一篇好策耳。”刘壘《隐居通议》卷十八《平园文体》：“后村《跋周益公亲书艾轩林公光朝神道碑后》曰：‘平园晚作益自摩厉，然散语终是洗涤词科气习不尽；惟艾轩志铭极简严有古意。’然予反复熟玩，其文平顺典雅则有之，谓之简古则未也。因记壮岁与西园傅公共观某人文字，其人亦试词科，傅公曰：‘此文未脱词科体也。’予曰：‘然盖词科之文自有一种体致，既用功之深，则他日虽欲变化气质，而自不觉其暗合，犹如工举业者力学古文，未

尝不欲脱去举文畦径也，若且淘汰未净，自然一言半语不免暗犯，故作古文而有举子语在其中者，谓之金盘盛狗矢’”。由方回、罗大经、刘壘等人的议论看，南宋文学（诗文等）之所以华而不实、凝滞呆板，主要因为“词科”的习气，而“词科”的习气，完全是“词科”的教育训练培养出来的。科举考试的一些“习气”，实际上是教育的“习气”。

“场屋之文”本身虽非文学，而且对文学有着许多不良的影响，但却属于最基本的文学创作训练，不经过这样的训练的人，几乎不可能成为文学家。宋人即便对“场屋之文”深恶痛绝，但多数人都要受此磨练，朱熹之父朱松云：“途穷势迫，计无所出，乃始挟书操笔，学为世俗所谓举子场屋之文者。其言决裂繁碎、支离曼衍而不宿于道，无用而可笑，不待详说，可知也。既冠，试礼部，始得脱去。”^②宋代许多士人都是经受如此磨练而最终超越此种训练成为文学家的。更重要的是这种基本训练，引起了全民对文学创作教育的重视。

在科举“利禄”的诱惑之下，文学创作训练成为全民的最基本的教育，文学教育因此而普及与深入。“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③具有文学才能的孩童，更被整个社会看重。“王元之，济州人。年七八岁，已能文。毕文简公为郡从事，始知之。闻其家以磨面为生，因令作《磨诗》元之不思以对：‘但存心里正，无愁眼下迟。若人轻着力，便是转身时。’文简大奇之，留于子弟中讲学。一日太守席上出诗句：‘鸚鵡能言争似凤。’坐客皆未有对，文简写之屏间，元之书其下：‘蜘蛛虽巧不如蚕。’文简叹息曰：‘经纶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为‘小友’。至文简入相，元之已掌书命矣。”^④“磨面”家庭出身的王禹偁，七八岁就“能文”，固然是“天才”，但若非文学教育普及于整个社会，没有一点文化基础的家庭很难出现这样的天才。这样的例子在宋代比比皆是：

寇公准八岁吟《华山诗》：“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宋白年十一，善属文。……杨亿年十一以童子召对，试诗赋五篇，下

笔立成，太宗叹异，以为秘书省正字。……晏元献公殊父本抚州弓手，晏幼能文，李虚已知徐州，一见奇之，荐于杨大年以闻。年十三，真宗面试诗赋，疑其宿著，明日再试，文采愈美，上大奇之。即除秘书省正字。……邢惇夫年十四，作《明妃引》。……钱希白年十七举进士，御试三题，日中而就。^⑤

大量文学“神童”的出现，首先说明文学教育的极大化普及，其次则说明文才已经成为整个社会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并非文学“神童”的孩子，则常常受到十分严格的文学教育，如“杨宣懿察之母甚贤，能文，而教之以义，小不中程，辄扑之。”^⑥在“能文”母亲如此严格的教育之下，杨察、杨真兄弟分别以榜眼和状元及第。

总之，有宋一代，可以说都是处于一种重文风气中的。科举内容与随之而来的教育，直接导致了全社会全民注重文学创作能力、注重文史知识培养的风气，文学教育在宋代差不多是全民普及的最重要的教育。正是这种风气，促成了众多的有文史修养的文学家以及文化巨人出现，促进了宋代文学以及文化的繁荣昌盛。

应该说明的是：宋代教育虽然以围绕科举考试进行，并不意味着没有反对的，宋代理学家大力提倡开设书院，其目的就在于法古圣贤之学行，纠社会功利之风。但是多数以此为初衷的书院不久即增设科举训练内容以顺人情，理学家本人也不能免俗。吕祖谦的丽则书院，魏了翁的鹤山书院，都是以善应科考而闻名；吕祖谦的《东莱博议》、叶适的《进卷》、陈傅良的《待遇集》也都是士人常相揣摩的科考范文。朱熹感叹说：“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⑦代表国家行为的科举取士制度在受到挑战时，很快显出了其权威性和调节功能。另外，宋代科举考试与明清科举相比程式化尚不算严重，宋人科举对策论和诗赋的重视远非明清人所能想像，宋代科举需要应试者具有相对广博的知识储备和人文修养，不像明清只需死读四书做好八股，即使欠缺经史子集的学养亦可中高科，因此宋代文学家的群星璀璨和文学

繁荣也就不是明清所能比拟的。当然,这一问题尚待专文探讨。

注释:

- ① 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1987(5).
- ②③⑪⑬ 脱脱.等.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67,467,1127,1170.
- ④ 沈枢.纲鉴总类[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下.
- ⑤⑳ 王銍.默记[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上,卷下.
- ⑥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6.1046
- ⑦⑩ 王称.东都事略[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四四,卷一一六.
- ⑧⑨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939,937
- ⑫⑭ 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九,卷九.

- ⑭ 葛立方.韵语阳秋[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五.
- ⑮ 范仲淹.范文正奏议[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上.
- ⑯ 刘昌诗.芦浦笔记[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五.
- ⑰ 章如愚.编.群书考索[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续集卷二十五.
- ⑱ 程俱.北山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十三.
- ⑲ 周行己.浮沚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七.
- ㉑ 欧阳守道.巽斋文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六.
- ㉒ 沈与求.龟溪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七.
- ㉓ 王明清.挥麈录[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三录卷一.
- ㉔ 朱松.韦斋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九.
- ㉕ 洪迈.容斋随笔,四笔[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五.
- ㉖ 邵博.闻见后录[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七.
- ㉗ 祝穆.古今事文类聚[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前集卷四十六.
- ㉘ 朱熹.朱子语类[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三.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Two Song Dynasties and Literary Education

LV Xiao-huan, ZHANG Ji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Institute of Literary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Education in Song dynasty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education on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Song Dynasty was testing of education in Song Dynast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education were both developed in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policy and social conduct of emphasizing civilians at the expense of army in Song Dynasty. The literary education became popular at all levels of society of the Song Dynasty unde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ith strong humanity.

Key words: the two Song Dynastie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conten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public and private schools; literatur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rooms; literary education

[责任编辑:渠红岩]